



在历史转折处的关键人物在思考什么？
在这里，我们读懂历史。

©侯宜杰 著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的转折处 / 侯宜杰著. — 广州 : 南方日报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-7-5491-0896-1

I. ①历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5848 号

LISHI DE ZHUANZHE CHU
历史的转折处

侯宜杰 著

出版发行：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：(020) 83000502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6 开

印 张：13.75

字 数：250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0.00 元

投稿热线：(020) 83000503 读者热线：(020) 83000502

网址：<http://www.nfdailypress.com/>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自序

本书付梓之前，出版社刘志一先生嘱写序言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而又不好意思方命，踌躇再三，只得写上几句。

退休以后，成了“自由人”，个人的活动空间很大。家政之余，空闲下来，又觉无聊，想来想去，仍不能忘情于过去所学。只是由于年迈体衰，精力不济，记忆力锐减，加以住所离单位太远，借书困难，不敢妄想于学术上有所造诣，便打算学着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，反正成与不成，均无所谓，权作度过余生的消遣。于是开始漫无边际地翻阅个人的藏书，有时古代，有时近代，兴之所至，随心所欲。自然，在翻阅的同时，也思考一些问题。遇到感兴趣者，或为人所不知，或为人所不谈，或有争议，或为掌故者，就搜集起来。适在此时，有家报社约稿，试着写了几篇，居然被采用，以后又从搜集的资料中选择一些题目继续写。本书中关于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作品，就是近三四年陆陆续续积累下来的，有些已经发表，有些尚未问世。

“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。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，非常贴近我们的时代，其间发生的一切事件和活动 in 政治舞台的人物，无论是正面的，还是负面的；先进的，还是落后的；革命的，还是反动的；真诚的，还是虚伪的，无疑更具启示或借鉴意义。书中的文章，大部分属于此类。虽然不少为读者所熟知，但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，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。但愿这本小书能对读者有些微帮助。

南方周末图书工作室总监张英先生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支持；刘志一先生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，书名亦为刘先生所定，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侯宜杰

2012年11月30日于北京

目 录

自序 / 001

第一章 清末民初诸现状

晚清的贿赂名堂 / 002

透明的选举 / 006

同文馆招生风波 / 009

两次不同的庆祝 / 014

剪辫风云 / 018

“大阿哥”溥儀的立与废 / 025

“官屠”岑春煊 / 031

“三霖公司”斗权贵 / 038

革命党人做贼 / 043

汤氏两兄弟 / 048

如出一辙 / 054

杨乃武与《申报》的一段机缘 / 058

第二章 预备立宪时代

预备立宪是怎样搞起来的 / 064

尚其亨出国考察丑闻 / 072

咨议局不愧为代议机关 / 075
中国最早的议会——资政院 / 081
晚清地方自治的尝试 / 088
刑法的里程碑 / 092
温世霖请愿获罪 / 095
末代状元刘春霖 / 099
资政院的两位总裁 / 106
民政部尚书善耆 / 112
刘廷琛拍马取辱 / 117
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 / 120
清朝何以速亡 / 131

第三章 民国后的袁世凯

袁世凯：从出山到逼宫 / 138
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尚难定论 / 144
袁世凯为何设置“国务卿” / 152
“国民代表”推戴袁世凯当皇帝 / 156
袁世凯的“信义” / 162
1915年帝制派的“国情”论 / 169
“六君子”与“二陈汤” / 174

第四章 人民理应享有自由

预备立宪时期的结社集会自由 / 180
预备立宪时期的言论自由 / 187
《大江报》两遭封杀 / 196
封杀书报应堂堂正正 / 202
袁世凯剥夺国人言论自由 / 206
“挂羊头卖狗肉” / 210

第一章 清末民初诸现状

现在无论什么报纸上，只要一讽刺作官的，是看报的人就没有不拍手喝彩的。不怕有三五个人交谈，但是一提到官场一层，你就去听吧，没有说好话的，这种现象大概得属我们中国为尊了。现在小民视官长如仇敌……

晚清的贿赂名堂

贿赂行为自古就有，历来不断，其名堂始于何时，则无从查考。笔者孤陋寡闻，见到贿赂名堂出现于正史之中的是明朝嘉靖年间。据《明史·杨允绳传》记载，总督和巡抚到职的时候，照例要贿赂权要，名为“谢礼”；有所奏请，也要贿赂，名为“候礼”。及其任满营谋升迁，或是避难求去，或是犯罪想着补救，或是做错事情希图庇护，那就“输贿载道”，花钱更多，只是这些均无什么名堂了。

晚清的贿赂名堂很多，而且还都有个很动听的名字。如过年送钱叫“年敬”，过节送钱叫“节敬”，夏天送钱叫“冰敬”，冬天送钱叫“炭敬”，地方大员出都送钱叫“别敬”，喜庆事送钱叫“喜敬”，送给女人的叫“妆敬”，送给读书青年的叫“文仪”，送给门房的叫“门敬”，送给仆人的叫“跟敬”。另外，尚有“陪敬”、“菲敬”等等。至于专门为买官、免罪等而进行的私下交易，有什么名堂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当时的京官俸禄不高，“养廉银”也不是很多，又没有条件搜刮民财，加上应酬多，生活一般并不十分富裕，无不想“吃”地方官，从他们身上捞一把。每遇督抚司道进京，邀请宴会，迄无虚日。即使素不相识、绝不相关者，也具帖邀请。地方官害怕得罪他们，临行皆要分别厚薄和地位高低，到各家“留别”，仅此一项，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例如张集馨，1845年补授陕西督粮道，道光皇帝召见后，他离京赴任时，仅“别敬”就用去一万七千两；以后升四川按察使，“别敬”用去一万四千两；再升贵州布政使，用去一万一千

两；调任河南布政使，又用去一万三千两。具体数目，大致是每位军机大臣四百两，六部尚书和都御史各一百两，侍郎与九卿各五十两，章京十六两，如有交情，或通信办奏折，则为一百两或八十两。另据同乡、同年和家世多少不等。张集馨是一位清官，第一次送“别敬”完全是借的钱，尚且如此之多，无怪清贫些的地方大员视进京为畏途了。对于那些私囊已饱、肥得流油的地方大员来说，这些是不成问题的。他们的行贿钱是哪里来的？当然都是下属奉献的，他们也是受贿者。官员送钱，平常有所谓“三节”、“两寿”。“三节”指端午节、中秋节和年节，“两寿”指受贿者本人及夫人的寿辰，再就是夏天和冬天各一次的“两敬”。据张集馨所说，他任陕西督粮道时，送将军的“三节”、“两寿”，每次八百两；送两名都统每节每人二百两；送八名八旗协领每节每人二十两，上等白米四石；巡抚分四季致送，每季一千三百两；总督按三节致送，每节一千两。银两之外，尚有表礼、水礼和“门敬”等杂费。

地方官到京里中央各部门办事，各部门承办人员也索要银钱，否则，就故意刁难，让你办不成事。地方官为了顺利办事，都有馈送。这些均属于普通的馈送，少则几两，多则十几两，算是照例。到了后来，就逐渐增加了。

1903年，庆亲王奕劻当上首席军机大臣也就是政府的首脑以后，情况发生突变。奕劻以贪婪枉法、卖官鬻爵著称，无钱不要，无贿不收，少亦不嫌，多则更好，细大不捐，来者不拒。各官皆有价目，官员买官都得走他的门路，故其门如市，人们将他的府邸戏称为“老庆记公司”。还在他当上首席军机大臣之前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听说首席军机大臣荣禄病危，奕劻将要进入军机，马上派杨士琦带十万两银票送去，并对他说：“这些微数目不过作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，以后还得特别报效。”奕劻从未一次得过十万两，当即笑嘻嘻地接受了。此后袁世凯报效得更多，月有月规，年有年规，节有节规，按时奉送，庆王府的年节、生日、请客、婚嫁、子孙满月及周岁，一切费用，都包了下来。1904年，御史蒋式理听说奕劻在汇丰洋行存款超过百万，上奏参劾。奕劻大惧，赶紧贿赂洋行的人作弊，躲过了一次厄运，但事后依然如故。陈夔龙当了直隶总督后，每年必定送去“冰敬”、“炭敬”数万两，其他缎匹、食物、玩好等尚不在内。陈璧送给他东珠、鼻烟壶等珍宝和五万两银票，一跃而升为侍郎。1907年，直隶道员段芝贵为了获得高官，先将其子、农工商

部尚书载振所倾倒的天津歌妓杨翠喜赎出献上，后来又送奕劻十万两寿礼，不久升署黑龙江巡抚，招致御史弹劾，引起政坛一场轩然大波。奕劻仍不思悔改，反而更加肆无忌惮。1908年3月其七十大寿时，京内京外各官皆来送礼。他表面上告诫属下不收礼物，暗中却准备好几个册簿，按送礼的厚薄多寡分为四级，一级为福字册，登记现金一万两以上及礼物值三万两以上的，另外存记其名在手折中；二级为禄字册，登记现金五千两以上及礼物值一万两以上的；三级为寿字册，登记现金一千两以上及礼物值三千两以上的；四级为喜字册，登记现金一百两以上及礼物值数百两的；不满一百两的列为另一册，寿言、诗文、屏障、楹联亦按册登记。仅此一次庆寿，据说所受现金总数不下五十万两，礼物不下一百万两。

上行下效，在奕劻带领之下，整个官场贿赂公行，官以价论，政以贿成，腐败至极。对此，朝野皆不讳言，谁都承认：“今日之政府诚腐败，且腐败至不可收拾。”（《今日政府之真相》，《大公报》1910年3月10日）“在上者卖官鬻爵，贿赂公行，坦然无可忌憚；在下者挈金载宝，钻营奔竞，恬然绝无羞耻。”（茶圃：《论筹备立宪当先整肃纪纲》，《国风报》第1年第17期）只要能够得到富贵，虽“巨奸大猾，俯首摇尾，不以为辱”（《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》上册，第126页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）。“上以贿求之下，下以贿献之上”，“衣冠之俦，官署之中，宴会之场，莫不曰运动、运动”。（《论贿赂为宪政上之最大障害》，《大公报》1910年1月17日）官场变成了“运动场”、“交易所”，这些人整日忙于收贿行贿，钻营夤缘，拍马逢迎，看戏，打牌，上馆子，逛妓院，不仅没有精力研究宪政，把预备立宪搞好，而且十分害怕民权发达以后丧失权位利禄，视立宪如洪水猛兽，嫉之如蛇蝎，恶之若仇敌，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。

对于吏治的腐败黑暗，朝廷是清楚的，也曾三令五申进行整顿，然而其已病入膏肓，没有多少成效，腐败反而更甚。广大人民恨透了当官的，把官场比之为“如虎之猛”，“如狐之媚”，“如蛇之狡”，“如蚤（蝎子之类的毒虫）之毒”，“如无知之偶（木偶）”，“如钻泥之鳅”，“如黑暗之洞”，“如无底之渊”，“如谷木之蠹虫”（《官场九如颂》，《大公报》1904年5月5—8日）。他们愤怒地指出：“呜呼，官诚今日中国之蠹哉！”（《中国

今日之官箴》，《神州日报》1908年4月25日）他们说：“作官的对待小民直如同牛马，比奴隶还不若”，“小民还说作官的好吗？那一切的感情还好的了吗？你瞧现在无论什么报纸上，只要一讽刺作官的，是看报的人就没有不拍手喝彩的。不怕有三五个人交谈，但是一提到官场一层，你就去听吧，没有说好话的，这种现象大概得属我们中国为尊了。现在小民视官长如仇敌……中国作官的确是国民的公敌”（《论中国国民对于官场感情最恶的原因》，《京都日报》1909年10月20日）。

透明的选举

民主选举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，无论选民选举议员还是议员选举行政长官，谁得多少票，谁应当选，均公之于众，让选民心里明白，从不将这些视为高度机密，而对选民封锁。因为选民为国家纳税，他们有权知道这些情况，并有利于对议员能否代表他们和行政长官能否执政为民实行监督；同时对议员和行政长官来说，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。

中国在清末一开始改革君主专制政治时，就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，实行透明的民主选举制度。

1909年，首先实行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，从初选到复选，每人得票多少均予公布，选民都能了解，当选之人若有舞弊情形，选民亦可向官府控告。咨议局议员选举议长、副议长和常驻议员，各人所得票数也在当地会议公报或报纸上登载。如报纸报道，江苏咨议局开会选举议长、副议长，到会者九十五人，以得四十八票为当选。第一次选举议长，仇继恒得四十七票，张謇得四十六票，夏寅官得二票，无人当选。于是进行决选，张謇得五十一票，当选。继而选举副议长，先选南京地区，仇继恒以五十六票当选；后选苏州地区，蒋炳章也以五十六票当选。由于两人票数相同，又抽签定其名次先后，结果是蒋炳章在前，仇继恒在后。（《江苏咨议局召集纪事》，《时报》1909年9月19日）

中央的资政院正副总裁由皇帝任命，不经议员选举产生。议员分民选（由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的）和钦选两种，民选议员选举时不管得票多少，均

予公布。钦选中也有先行初选，再将当选人上报，由朝廷钦定的，在初选中，谁得多少票同样公布。如各部院衙门官员有三十二个议员名额，初选之后，凡得票的一百多人，从最多的六十五票到最少的一票，都公布出来。（《盛京时报》1910年3月23—24日）

清末的最高行政机关先是军机处，后是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，大臣均由皇帝任命。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摄政王载沣任命被罢官家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进行镇压。为收拾人心，11月1日又准内阁各大臣辞职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。11月3日，公布资政院拟订的《十九信条》，其中规定“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，皇帝任命”。故有人提出前两天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是不合法的，袁世凯也怕不经选举贻人口实，请朝廷收回成命。同月8日，资政院选举内阁总理大臣。报纸报道说，议员到会者八十七人，开票后，袁世凯得七十八票，王人文、岑春煊、黄兴各得二票，锡良、那王（那彦图）、梁启超各得一票。（《资政院纪事》，《大公报》1911年11月11日）这是清末进行的唯一一次议员选举行政长官，同样是透明的。虽然这次会议由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，出席的议员未能达到规定的人数，不得开会，选举是不合法的。

民国以后，选举透明制度一直延续下来。如1912年7月19日参议院选举陆征祥内阁的补充阁员，议员共出席九十九人，选举结果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所提的六名总长全部落选，各人所得同意与不同意票数均登于《政府公报》。7月26日进行第二次选举，五人通过，一人落选，所得同意与不同意票数亦登载于《政府公报》。

1913年10月6日，国会选举第一任正式大总统。政府认为大总统选举“关系至为重要，必须随时分电各省，以安人心而免谣诼”，特通知电报总局，除关于军事及外交紧要事件外，其他各项电报暂时缓发，专发选举总统问题。故选举的详情能在第一时间迅速为国人和各国所知。

选举开始投票时只有议员在场，开票时各国驻京公使、特派员和记者均到场参观，中国人士也不少，仅女士即有三十余人，旁听位置上座无虚席。

第一次投票的结果统计出来，各人所得票数是：袁世凯四百七十一票，黎元洪一百五十一票，孙武三票，康有为十一票，梁启超四票，王赓三票，孙中山十三票，段祺瑞十三票，伍廷芳三十三票……此外尚有废票二十余张。投

票总数为七百五十九，因所得票数皆不足总投票数的四分之三法定票数，故无人当选，必须进行第二次投票。

第二次投票后各人所得票数是：袁世凯四百九十七票，黎元洪一百六十二票，伍廷芳二十二票，孙中山十二票……总投票数为七百四十五，仍未有人达到法定票数而当选，必须进行第三次投票。

按照大总统选举法，第一、二次无人当选，第三次应在所得票数最多的二人中进行决选。袁世凯和黎元洪得票最多，此时在场议员还有七百零三人，袁世凯得五百零七票，以过半数当选。（见《老新闻》第113、114、117页）

此次选举是在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的“二次革命”、孙中山遭到通缉之后进行的，事先没有确定候选人，也无人竞选，而且袁世凯为了保证自己当选，还派军警包围会场，进行胁迫。但议员并未被吓倒，不仅有许多人投了黎元洪等人的赞成票，还有少数人投了孙中山的赞成票，致使袁世凯两次均未当选，只能在第三次决选中获胜。这种选举虽然有票数分散的缺点，却能使议员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，行使自己的权利。

国民党统治时期选举总统，虽然增加了候选人，实行差额选举，选举的结果也是透明的。如1948年4月19日“国民代表大会”投票选举中华民国正副总统时，蒋介石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总统。副总统候选人共提出四名：李宗仁、孙科、程潜、于右任。选举之前，蒋介石召见李宗仁，告诉他副总统候选人已由中央提名孙科，希望他能退出竞选，李宗仁当即表示决不退出。第一轮选举，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，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，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，于右任不足五百票，无人当选。第二轮选举后，得票依旧是李宗仁最多，孙科第二，程潜第三。蒋介石要程潜退出选举，并许诺补偿他的全部竞选费用，程潜愤怒地拒绝了。第三轮选举，仍无一人票数过半，只有从得票最多的李宗仁和孙科二人中决选。结果，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，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。那时有收音机的家庭若是愿听选举的新闻，均可从收音机里听到播音员不断地唱票声音：“李宗仁”、“李宗仁”、“孙科”……

一般而言，选举国家领导人是件好事，本应光明磊落地进行，让国人知道选举的情况，任何政府都无权对国人封锁。除非确有难言之隐，否则有什么理由不让国人知道呢？

同文馆招生风波

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，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弟，受封恭亲王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，咸丰任命他为与英、法议和的全权大臣。1861年，咸丰皇帝去世，他与慈禧密谋，发动政变，受命为议政王，掌管军机处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（又称总理衙门）。1865年，因受慈禧猜忌，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。旋在许多大臣请求下，复任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大臣等职。

奕訢在奉命议和、办理外交时，即深感要办理好外交，必须先了解外国情况，而要了解外国情况，必须先熟悉其语言文字，遂于1862年奏请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，招收十五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。这虽是一所新式学校，由于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，学生限于八旗子弟，并未遇到阻力。奕訢还主张自强，学习西方，大力支持李鸿章等人办理洋务，赶上或超过洋人，最后达到雪耻的目的。看到洋人制造机器、枪械、轮船等，无一不与天文、算学有关，上海、浙江等地也在讲求仿造洋人的轮船等事，他认为若是不从根本上下功夫，即使学些皮毛，也无益于实用。于是在1866年12月，他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，专门学习天文、算学，招生的对象也由八旗子弟扩大到了二十岁以上的满汉举人、五贡（恩贡、拔贡、副贡、岁贡、优贡，都算正途出身资格）、秀才，以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，聘请洋人教习。朝廷批准照办。

不料这件事却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。有人指出，以堂堂天朝竟要拜夷人（即洋人）为师，实乃中国人的奇耻大辱。

奕訢没有退缩，1867年1月又上一折，进一步说明开设天文、算学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，还提出将招生对象再扩大到翰林院编修、进士等人。朝廷又予批准。

这一来，可极大地刺激了道学先生们的敏感神经，激发了他们的“爱国主义热情”和强烈的“民族感情”，对此举痛加批判鞭挞。

1867年3月5日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，上折说：若以自强而论，则朝廷之强，莫如整纪纲，明政刑，严赏罚，求贤养民，练兵筹饷诸大端；臣民之强，则惟气节一端。臣民有了气节，“以之御灾而灾可平，以之御寇而寇可灭”。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“机巧之事”，又借升官、银两以诱之，“是重名利而轻气节，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？”这无异于是说奕訢太“右”了，犯了“方向性”、“路线性”的重大错误，把国家引向歧途。此折虽“为一时推重”，不过他人微言轻，朝廷没有理会。

过了半个月，大人物倭仁亲自披挂上阵了。倭仁字艮峰，蒙古正红旗人。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进士，历任侍读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等官，是著名的理学大师。咸丰皇帝在世时，因其只会说教，不会办事，把他视为“迂儒”，令其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，故意用违其才，将其投置闲散之地。慈禧执政以后，才把他召回北京，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后任工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命其教授同治皇帝读书，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不久，他在慈禧与奕訢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慈禧一边，又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。

他上奏说：“立国之道，尚礼义不尚权谋；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。”今学技艺，“又奉夷人（即洋人）为师”，即使学成，也不能起衰振弱。何况“天下之大，不患无才。如以天文、算学必须讲习，博采旁求，必有精其术者，何必夷人？何必师事夷人？”而且夷人是我们的仇敌，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他们称兵犯顺，侵犯我京师，震惊我宗社，焚毁圆明园，杀害我臣民，这是“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，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，饮恨至今，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，能一日忘此仇耻哉？”科举出身的人都是国家培养的有用人才，若使他们“变而从夷”，正气为之不伸，邪气因而更盛，数年以后，就要把中国人都驱赶到夷人那边去了。

倭仁的地位远远高于张盛藻，其奏折的阴毒性也远远超过了张盛藻。他